

“察世俗”和梁发

张 静 庐

熟悉近代报刊历史的人，談論起来总会联带提到鴉片战争前有一种外国侵略者用中文編印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简称“察世俗”）和曾經參加編輯这个刊物的中国人梁发。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叙述中文杂志时說：“若在我国而尋求所謂現代的報紙，則自以馬六甲所出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为最早，时民国前九十七年西历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也。”又說：“‘察世俗每月統紀傳’自嘉庆二十年起至道光元年（1821）止，凡七卷，五百七十四頁。內有数期，由馬礼逊、麦都恩及梁发三人編輯，余均出来米怜一人之手。梁氏为米怜所收之教徒，我国之第一个基督新教教士，亦即正式服务报界之第一人也。”

“察世俗”是英國倫敦布道會派遣到中國來的第一个傳教士馬礼逊（Robert Morrison）創辦的教会刊物，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小小的中文杂志和他們輸入的鴉片一起，來麻醉和毒害中國人民。这个以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和譯員的名义而身穿副領事服飾，于年薪一千三百磅以外还受英國政府直接津貼的馬礼逊，不用說是英國侵略政策的执行人，自然也十分仇視中國。他为了侵略和毒害中國的野心在当时受到一些阻撓，而在給朋友一封信里竟說：“英國人在中国所受之不公平及恶劣待遇，簡直不容易忍受。同时这种不幸，也不是在天涯沒有亲身經歷过的英國人所能設想。”他在“察世俗”发刊辞里說明出版这个刊物的宗旨，是要“发揚”中國人民的智力：“中國人民的智力，受政治之束縛，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載。一旦欲喚起其潛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揚踔厉，夫豈易事；惟有抉擇适当的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終不懈，庶几能換回于万一耳。”那末，怎样來“发揚”和“換回”呢？他认为只有通曉教义，才能使“下品”人升格为“上品”人，愚昏人变为达智的人，所以他說：“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隨人之能曉，隨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載道理各等

也。……人最悅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悅讀也。”一句話，是阴谋通过傳教来培养一批洋奴和买办的“上品人”。这个刊物在米怜（William Milne）去世前一年就停刊了。据戈公振“英京讀書記”說，这个刊物現存英國博物館的也不完整，只有“嘉庆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均正月至十二月，凡七十四冊”云。

馬礼逊选择馬六甲作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最适当的前哨，是因为南洋各地有众多的中國侨民，又不受中國法令的管轄，当时的清朝政府是严禁外国人到中國內地來傳教的。他們在那里以“越恒河布道差会”的名义，办起了一所英华书院和一个印刷所，这个印刷所除用来印刷“察世俗”以外，还印了許多用中文翻譯的“聖經”和其他宣傳教义的小冊子。

馬礼逊自称是所有英國人里当时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三个人中的一个，他于1808年以商人身份来到广州，繼續学习了中国的語言文字以后，便着手“华英辞典”和“新約”的編譯工作。因为他这样地忠实执行英國的侵略政策和毒害中國人民，所以当他在1824年回到倫敦的时候，受到英王乔治第四的召見和恩礼。同时，他还吸收了几个中國人入教受洗，其中最早的一个叫蔡亚高，是印刷工人，后一个就是梁发^①。（按商务印书館版“中国报学史”插图本有一幅馬礼逊和他两个助手梁发、梁滔合編書报图，据麦沾恩“梁发”說，这幅画是1829年画的，图中除馬礼逊外，坐的一个是陈老宜，站的一个是李十公，并非梁发，戈注疑誤。）

梁发一名梁亚发，广东高明县人，生于1789年（乾隆五十三年），卒于1855年（咸丰五年）。他原

^① 据清清理“馬礼逊小傳·早期的中國信徒”說：“梁亚发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改正教信徒，但是最先接受基督的道理的，他却并不是第一人，第一位在馬礼逊手中受洗的，却是蔡亚高。”

来也是在广州从事木板雕刻的印刷工人，1810年被馬礼逊雇用刻印他中文翻譯的“使徒行傳”和部份的“华英辞典”。1815年随米怜同去馬六甲^②，編印“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第二年受洗为基督教徒。在这期間他除用笔名“学淳者”、“学淳居士”写过許多文章外，还从1819年到1833年間写过十二种宣傳教义的小冊子，也翻譯过有关我国古代农事的书和“祈禱文”，这本“祈禱文”并在1833年曾經試用他当时手刻的鉛活字排印出版过，可以說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中文鉛排本了。由于清政府法令的限制，除澳门一地外，不准在内地傳教和印发教会宣傳品，因此，梁发曾經多次利用广东乡試和府試的机会，把他們在馬六甲編印的“察世俗”和其他教义小冊子，偷运进来发卖，并且也曾几次被官厅逮捕并加以刑罰。从“察世俗”停刊后，他就不再从事报刊編輯工作，变为一个地道的基督教牧师了。1848年起，他和馬礼逊的女婿合信(Hobson)，合作，在医院里專任傳道工作，直到死去。在最后一封信里还希望能够增加寿命数年，使他有智慧和能力向中国人宣傳“福音”，并祈求“上帝大降圣灵，使他們回心轉意。”梁发就是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的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报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从1823年馬礼逊正式委任他为宣教士起，就直接由倫敦布道会支給工资，到六十六岁去世止，沒有中断过。

这样的一个梁发，当然很期望他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衣鉢，“不再为中国人办事”，在临終的时候，还“屡用祈禱和眼泪，劝其爱基督教及为基督教服务。”可是他的儿子梁进德虽然自幼便受洗而为基督教徒，但沒有依从他父亲的囑咐，据合信給倫敦布道会一封报告里說：“而他与別人交接的时候，也不自承其为基督徒。”1839年梁进德当了林則徐的幕

僚，替林氏从当时在广州出版的英文“广州周報”和在澳门出版的其他外國刊物中，选譯其中与中国有关的重要新聞，編成“澳門新聞紙”六冊，这不仅帮助了林則徐了解当时的敌情，到现在仍然是研究近代史，特別是鴉片战争前期的国际关系史的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資料，并且是我国近代报刊史上最早的一种翻譯杂志。(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說“林文忠公命譯外國近事，名为‘西國近事匯編’月出一冊，是我国报章之最早者，是为月报之始。”应是“澳門新聞紙”的誤記，現南京图书馆藏有鉛本。按“西國近事匯編”为美国傳教士金楷理所譯，1873年江南制造局出版。)

梁发虽然竭尽他大半生的精力替外国侵略者服務，但他的著作在当时也曾經起过一些作用，如他著作中流传較广的有1832年所写的“劝世良言”，太平天国起以前的洪秀全就从这一本书得到启发，汲取了其中基督教里天父单一神权思想和“平等”观念，創立了拜上帝会。此外，梁发还在1837年为了反对鴉片輸入，写过一本“鴉片速戒文”，据見过的人說，这本小冊子“語极痛切”，是鴉片战争前反对吸食鴉片烟的通俗宣傳品，可惜沒有流传下来，否则对我们今天研究梁发这个人的思想发展，定会有較大的用处。

② 賀圣蓀“近代印刷术·凸版印刷术”說：“1814年馬礼逊收得刻工蔡高为教徒，此为我国人崇信基督教新教之始。……乃遣助手米怜及蔡高二人同往馬六甲，設立印刷所。”据“馬礼逊小傳·連翻的不幸”引馬礼逊一封信說：“此間政府目下正在与印刷我字典的印刷所为难。我旧时的助手高先生已經躲避去了。”又說：“1816年的十二月三日，轉信的人，名叫梁亚发，是广州的一位印刷工人，他是在1815年春間，与米怜一同到馬六甲去的。”賀說疑誤。

作者來函更正

“图书馆”编辑同志：

我們寫的“繼承和發揚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革命傳統”一文（刊于貴刊1961年第二期上），由于疏忽，运用了一些回忆材料。现发现有数处史料失实，請求更正。

1、第41頁，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之政治分化，文內誤为“五卅运动前夕”，实际应为1925年8月，即五卅运动后；

2、第42頁，應修人同志在1926年寫的“上海通信图

書館與讀者自由”一文中，应為“應修人給元昌的信”中；

3、第42頁，上海通信图书馆被封是在1929年5月4日，文內誤为1928年；

4、第43頁，誤將S. T. T.认为“上海通信图书馆”拉丁化新文字之縮写，应是國語羅馬字 Shanghae Tongshinn Twshrgoan的縮寫；

5、作者次序亦請更正为卢申岳、孟昭晋、紀国祥。

最后，第43頁，“有許多图书分类法是異常……”应是“有許多图书分类是異常……”的誤排。

卢申岳、孟昭晋、紀国祥

七月二十五日